

# 旅游扶贫中社区居民态度的分异与主要矛盾 ——以中俄边境村落室韦为例

李燕琴

(中央民族大学管理学院, 北京 100081)

**摘要:** 错综的矛盾常令以旅游业扶贫的乡村很快面临发展的瓶颈。以内蒙古边境村落室韦为例, 以身处贫困漩涡中心的社区居民为研究对象, 根据居民介入当地“家庭游”时间不同分为3组, 通过深度访谈和问卷调查, 剖析不同居民在旅游的经济、社会和文化影响感知方面的差异, 从社区居民态度角度揭示出困扰当地旅游发展的三对主要矛盾, 即负向的经济影响感知与正向的社会文化影响感知、居民强旅游支持与弱幸福感、高参与意愿与低政策评价。围绕这些矛盾, 借鉴国内外经验, 提出贫困地区破解旅游发展瓶颈的两大政策调整方向: 一要建立以收入提高、分配公平和文化保护为核心支撑的多元化扶贫目标; 二要注重政策的差异化和动态性, 充分尊重社区居民的非同质化特征。

**关键词:** 旅游扶贫; 矛盾; 社区居民; 态度分异; 内蒙古室韦村

**文章编号:** 1000-0585(2011)11-2030-13

## 1 引言

2009年世界银行发布名为《从贫困地区到贫困人群: 中国扶贫议程的演进》的评估报告, 报告在肯定中国取得的史无前例而令人羡慕的减贫和增长成就的同时, 也指出中国减贫任务仍然艰巨。报告指出, 按2005年美元购买力平价, 中国仍然有2.54亿人口每天的花费少于1.25美元的国际贫困线<sup>[1]</sup>。贫困人口绝大多数(约90%)分布在我国农村, 同时, 70%的旅游景观、近1/2国家级风景名胜区集中在这些地区<sup>[2]</sup>, 因此“发展旅游”正日益成为农村地区摆脱贫困的重要手段。

20世纪90年代以来, 关于中国旅游扶贫的研究逐渐兴起, 并成为旅游领域的研究热点<sup>[2~4]</sup>, 大量的研究成果有效推动了旅游扶贫工作在中国的开展。但很多学者也关注到现有研究的不足。丁焕峰<sup>[3]</sup>认为目前旅游扶贫的一般性研究多, 较深层的主题研究少; 定性分析多, 有理论基础的定量研究少。李佳等也发现<sup>[2]</sup>, 中国旅游扶贫研究偏重区域层面的宏观分析, 对景区和村镇等微观单元研究不足。曾本祥则指出<sup>[4]</sup>, 相对于各地旅游扶贫遍地开花的局面, 纵观国外越来越深入的“面向贫困人口的旅游”(PPT: Pro-Poor Tourism)和“消除贫困的可持续旅游”(ST-EP: Sustainable Tourism-Eliminating Poverty)研究, 中国的系统化旅游扶贫研究才刚刚开始并处在初级阶段。他认为绝大多数研究并没有针对贫困人口——这个身处贫困问题漩涡中心的核心人群, 去深入探讨旅游对贫

收稿日期: 2011-03-09; 修订日期: 2011-06-28

基金项目: 国家民委项目(08ZY21); 中央民族大学青年教师科研基金项目(CUN11A)

作者简介: 李燕琴(1971-), 女, 河北香河人, 中央民族大学副教授, 博士, 研究方向为生态旅游、社区参与、游客管理等。E-mail: yunshi1999@sohu.com

困人口的社会、经济和其他方面的影响。而无论中外，目的地居民正逐步被视为旅游产品的核心<sup>[5]</sup>。学者普遍认同，旅游业的成功开发离不开社区居民的支持<sup>[6~9]</sup>，许振晓等<sup>[10]</sup>对九寨沟旅游核心社区的研究证实，居民从旅游发展中感知获益有助于他们对当地旅游发展持更积极的态度，而成本感知则会产生消极影响。近几年，国内目的地居民旅游感知与态度研究颇受关注，但现有研究区多集中于旅游开发相对成熟的世界遗产地，如黄山<sup>[11]</sup>、西递<sup>[12]</sup>、九寨沟<sup>[10]</sup>、平遥及丽江古城<sup>[13]</sup>等，缺乏对处于旅游发展早期阶段的贫困地区居民感知与态度的深入研究。而 Doxey<sup>[14]</sup>早在 1975 年就提出了目的地居民激怒指数模型 (Doxey's Irritation Index)，强调旅游发展的不同阶段，社区居民的态度存在分异。

旅游扶贫早期，目的地社区的惯性发展和旧有格局被快速打破，旅游对社会、文化、经济等方面的影响不断加剧，是各种矛盾集中爆发的时期。国外研究表明，旅游影响并非均质分布，积极影响较多的被相对富裕和有一定人力、物质资本的人占据，消极影响则更多地转移在极度贫困的人身上<sup>[15]</sup>，不均衡发展为区域的各种冲突埋下隐患。社会能否稳定，正如房屋是否牢固一样，结构至关重要，旅游扶贫引发的社会结构突变使居民心理以及在发展进程中担当主要管理角色的政府都面临着巨大的挑战。为此，通过对旅游扶贫早期社区居民感知与态度的调研，知其所想，感其所感，对把握主要矛盾，有效调整地方政府角色定位和工作重点，做出科学决策，保障地区经济、社会的持续、稳定发展，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张伟等<sup>[16]</sup>等在安徽省铜锣寨风景区的研究是不多的从旅游扶贫开发对贫困人口影响角度进行分析的成果，调查表明早期阶段景区贫困人口通过参与旅游开发活动能够获得经济收入实现脱贫致富，但由于主管部门忽视对贫困人口的扶持和引导，经济效应的可持续性差。该文偏重经济影响，社会、文化影响阐述较少，统计样本中除贫困户外，还包括部分政府工作人员。为适应现实中旅游扶贫工作的需求，该领域更深入地研究亟待推进。

本文选择处于旅游扶贫早期的内蒙古北部中俄边境村落室韦作为案例，根据当地家庭参与旅游发展时间不同分为 3 组，对比其对社会、文化、经济影响感知方面的差异，从社区居民态度角度揭示出困扰当地旅游发展的三对主要矛盾。同时，借鉴国内外经验，对同样处于旅游业发展初期的贫困地区政府如何做好政策响应提出若干建议。

## 2 研究区概况

室韦位于额尔古纳市西北部中俄边界的额尔古纳河边，是我国唯一的俄罗斯民族乡。全乡辖 12 个自然村屯<sup>[17]</sup>，俄罗斯族人口占总人口的 42%。居民以俄罗斯风格的“木楞”为居所，河畔、农庄、语言、风俗到处都体现着浓浓的异域风情。但由于地处高寒地区，无霜期只有 95 天，室韦原以渔猎和低收益的种植、养殖业为主，农民生活水平一度偏低。

2004 年，借助国家扶持人口较少民族发展的 20 万元资金，凭借当地独特的旅游资源，室韦乡筛选出 10 户俄罗斯族家庭，每户投入 1.5 万元，启动了以“观景、科考、体验”为主的民俗家庭游试点。但受市场规模限制，当年还只是以承担公务接待为主<sup>[18]</sup>。2005 年，室韦乡被评为“中国十大魅力名镇”，俄罗斯家庭游作为旅游品牌正式对外营销，随知名度和影响力不断提高，慕名而至的游客和前来考察的领导迅速增加，条件较好、善于经营的家庭接待户在短短一年内，就一跃成为收入 20 万元的富裕户。

室韦、恩和、临江是室韦乡发展俄罗斯家庭接待的主要村屯，他们的发展可归纳为“政府+接待户”、“企业+接待户”两种模式<sup>[19]</sup>。室韦村、恩和村的发展以政府推动为主。2005年，额尔古纳市筹措资金3亿多元，修建了通往室韦乡的三级油路，完成了自来水工程，安装了节能路灯，并对室韦村俄罗斯家庭房屋进行了翻新。临江屯的发展则以企业投资为主。2006年，一公司入驻临江，整体包装、重点扶持7户俄罗斯家庭从事家庭游；后当地居民纷纷效仿，自发改善条件，从事家庭接待<sup>[16]</sup>。截至2008年6月，三个村屯的家庭旅游接待达68户，2007年接待国内外游客6.68万人次，实现旅游收入500万元。

三个村屯中，室韦村作为中俄口岸所在地及曾经的乡所在地，家庭游规模最大，2004年启动的10户俄罗斯家庭7户在此村，到2007年从事旅游接待的共34户，旅游收入达到300万元。本文即以该村作为案例研究区。全村有1300余人290户左右，其中具有俄罗斯血统的400多人。家庭游为当地旅游收入的主体，2007年开始有人从事沿界河的骑马游，但仍处于起步阶段，收入不多。另外，有少部分家庭通过售卖纪念品、奶制品、蔬菜等从旅游业中受益。

### 3 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2008年7月笔者在室韦俄罗斯民族乡调查。研究采用质性与量化相结合的方法，总的原则是以质性研究发现问题，以量化研究进行问题检验和原因探索，进而在政策层面提出定性建议。调查由4人调查组共同完成，质性研究包括4次焦点团体座谈会和10余次深度入户访谈，焦点团体座谈会为与额尔古纳旅游局、室韦乡乡委会以及调查前后与室韦(村)管理委员会各1次，调查地点在各自的办公地点；深度入户访谈对象包括室韦村有代表性的家庭接待户及在问卷调查中对当地发展表现出极大关注度的受访对象，以家主为主，偶有夫妻共同参与，调查分两组展开，2人1组，调查方式为无结构式，问题围绕“你认为室韦旅游发展对你有哪些影响”、“你认为室韦旅游发展中所面临的主要问题是什么”展开，随受访者提供的想法和事件进行更深层次交流。以录音的方式对焦点团体座谈会和重要的入户访谈进行记录。为确保质性研究的可靠性，采用了调查人员多角化、参与者反馈以及自我反省等技术<sup>[20]</sup>。量化研究中，考虑到旅游扶贫开发的特殊性，受访对象根据社区居民参与当地旅游发展的时间以及受旅游扶贫政策的影响不同分为3组(表1)。以往研究表明，社区不应该被视为同质性的<sup>[21]</sup>。Lankford等的研究发现，即使象美国哥



图1 室韦的俄罗斯民俗之家

Fig. 1 Russian folk hotel of Shiwei village

表 1 案例地受访居民的基本属性特征表  
 Tab. 1 Features of residents in the case destination

特征	第 1 组	第 2 组	第 3 组
民族	俄罗斯族/6；鄂温克族/1	俄罗斯族/9；蒙古族/1；汉族/8	俄罗斯族/10；蒙古族/3；汉族/15
本地居住时间	20 年以上/3；生长于此/4	10~19 年/5；20 年以上/3；生长于此/10	1~9 年/13；20 年以上/5；生长于此/10
是否从事旅游工作	从事/7	从事/18	从事/5；不从事/23；
是否旅游接待户	是/2004/7	是/2006//5；是/2007/10；是/2008/3	否
接待户床位数	10 以下/3；11~20/1；21 以上/3	10 以下/8；11~20/7；21 以上/3	无
家庭年收入	3 万以下/2；3~5 万/1；8 万以上/4	3 万以下/17；3~5 万/1；	3 万以下/26；3~5 万/2；
与游客接触时间	3 小时以下/1；3 小时及以上/6	3 小时以下/11；3 小时及以上/7	3 小时以下/26；3 小时及以上/2

伦比亚河谷这类只有少数居民的乡村地区，当被问到旅游如何影响他们的生活和社区时，居民在认知上也呈现多样化反映<sup>[22]</sup>。本研究中，第 1 组为 2004 年接受 1.5 万元扶贫资助的 7 户接待家庭，样本量占总体的比例达到 100%；第 2 组为 2005 年后发展起来的接待家庭，他们或多或少受到扶贫政策的影响，如相关培训、房屋翻新等，但力度远小于第 1 组，该组接受调查总数为 18 户，占总体（27 户）比例为 66.7%；第 3 组为目前从事其他与旅游有关工作以及未来两三年愿意参与到当地旅游发展中的住户，共 28 户，访谈中从室韦管委会和接待家庭户都了解到，该部分总体（111 户）与第 1 组、2 组总体（34 户）合计约为全村总住户（290 户）的一半左右，故该组样本量占总体的比例约为 25.2%。故本次调查三组样本均符合“总体较小时，最小的样本数最好为总体的 20%”的样本量统计分析要求<sup>[23]</sup>。

态度的测量，大部分研究包括了旅游影响感知以及期望的旅游发展方向两部分<sup>[24]</sup>。此外，本次调查还特别关注了居民的幸福感和社区参与意愿，居民幸福感提升是“旅游扶贫”的终极目标，社区参与则是保障旅游扶贫公平、有效的重要手段。社区居民影响感知部分的问卷题目设计以相关研究为参考<sup>[24]</sup>，部分题目选自陈正丰<sup>[25]</sup>在台湾雾台部落的调查。幸福感的测量采用以往研究中证实简便有效的单项量表主观幸福感测量方法<sup>[26]</sup>。问卷题项采用 5 点李克特量表，1~5 分别表示“非常不同意”到“非常同意”。数据分析采用统计软件 SPSS16.0。

#### 4 研究结果

表 1 可见，俄罗斯族、当地居住时间长的居民在旅游业发展中获得了更多的发展机会，如第 1 组居民居住时间全部在 20 年以上，7 户中有 6 户为俄罗斯家庭。由于发展早，这些家庭目前已具有较为稳定的客源，第 1 组收入明显高于第 2、3 两组。此外，从与游客的接触时间上看，从事家庭游接待的前两组要明显高于第 3 组。

#### 4.1 质性的研究结果

问卷调查之前,通过与额尔古纳旅游局、室韦乡委会、村管理委员会及社区居民多次访谈(表2),形成对案例区发展背景和面临问题的全面了解。从发展阶段看,室韦村正从最初“齐心协力”与旅游业“亲密接触”阶段,过渡到“各有所思”、“矛盾积聚”的发展瓶颈期,这一阶段能否处理好,关系到其未来能否持续发展。突出问题表现在:

表2 访谈中显现的主要问题

Tab.2 Main problems in the present interview

访谈对象	部分受访者原话	主要问题
额尔古纳旅游局	各家庭户“价格标准不一样,不公平,服务不规范”、“互相杀价,互相拉客,影响魅力名镇建设”;“魅力名镇一夜成名,作为景区基础差,起点低……缺乏有影响力的旅游活动项目……各政府及有关部门过去强调以扶持发展为主,相应地管理促进工作没有及时到位”。	家庭游从业人员服务水平低、缺乏全局观念和团队精神,无序竞争现象存在;管理部门对游客增多的市场现象缺乏足够的心理准备。
室韦乡乡委会	“室韦宣传大,恩和比不了”;“恩和要做的慢慢比室韦好,慢慢可能改观”。	室韦、恩和、临江三个村屯都有家庭接待户,如何发挥各自优势亟待解决。
室韦(村)管理委员会	“侧重发展了没有侧重规范……发展步伐和规范步伐产生距离……规划正在制定中,重点打造几条街道”;“想把室韦家庭游组成协会,自己管自己,现在已经初步成型,还有待完善……现在老百姓没有这种意识……构成了发展的瓶颈”。	家庭游协会正在建设中,但缺乏有能力且愿意担当此任的主导者,因此只能由村委会暂时托管;为接待更多游客,传统房屋改扩建问题突出,旅游规划正在制定中。
室韦村居民	“不搞家庭游干什么去,没办法……挣钱供孩子上大学”;“我弟妹家是第一家(家庭游户),但她家现在没游客,很多后来的外来户却有游客”;“你说给少数民族搞家庭游的20台电脑,现在就发了这么几台,那其他电脑跑哪儿去了”;“搞家庭游协会,现在找不出个公平人儿,事儿,老多了,谁也不愿意给管这个烂摊子事。”“目前搞个4、5年,80%的人还处得挺和睦的,咱不能针对一两个,一两个代表不了一个整体,也有极个别的人……”。	前期开展接待的家庭获得了可观的经济收益,居民开展家庭接待热情高涨,但客源竞争激烈、分配不均成为矛盾焦点之一;旅游发展正导致该地区人际关系淡薄,社会关系复杂化,个别旅游大户之间相互诋毁现象突出;居民述说欲望强烈,问题反馈渠道较少;一些外来的开发者抢占了客源;政府在信息、资源分配方面未做到平均化。

(1) 各方都在努力,但缺乏合力。旅游局关注区域宏观的持续发展,乡委会关注村域间协调,村委会注重微观问题的解决,居民则对自身利益及是否被公平对待更关心。无法形成合力的重要原因在于管理模式上依旧是自上至下的传统方式,缺乏对于居民态度的基本了解,使管理者和被管理者之间矛盾日益突出,如管理者认为社区居民“缺乏全局观念和团队精神,无序竞争”,而被管理者认为政府“分配不均”;管理者抱怨家庭游协会会长难觅,居民响应差,被管理者也觉得自己满腹问题无处诉说。

(2) 矛盾多元化,解决难度大。由于政府部门对旅游急速发展的形势估计不够,在心理、机制、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准备不足,各种矛盾集中爆发,如村域间、政府与居

民、居民之间的矛盾都很突出。它们已严重制约室韦旅游的进一步发展。

面对错综的矛盾，如何化解？把握居民感知，建立起由下至上的服务型政府管理模式是根本，量性研究揭示出旅游扶贫早期社区居民态度中三对主要矛盾。

#### 4.2 负向的经济影响感知与正向的社会文化影响感知

居民影响感知分经济、文化、社会三方面，每方面由4个观测变量组成（表3），对反向观测变量校正后取均值得到  $\bar{E}$ 、 $\bar{C}$ 、 $\bar{S}$  三个影响指标，数值越大，获益或正向感知越强。 $\bar{E}$ 、 $\bar{C}$ 、 $\bar{S}$  旁括号中数字为 ANVOA 的分析结果，3个组别在经济影响感知上差异最大。为更好的反映差异，比较采用了均值和同意率两个指标。结果表明，居民在经济方面，负向感知强烈（ $\bar{E}=2.92$ ），只有39.6%的人认可经济上获得了更多好处；文化方面，居民基本持中立态度， $\bar{C}$ 的数值3.19虽超过3，但同意率却略低于50%；对于社会影响，居民则更倾向于正向的感知（ $\bar{S}=3.37$ ），同意率为54.7%。

表3 居民的经济、文化和社会影响感知

Tab. 3 Resident perceptions to the economic, cultural and social impacts of tourism

问题	第1组		第2组		第3组		总体	
	均值	同意(%)	均值	同意(%)	均值	同意(%)	均值	同意(%)
E1: 发展旅游使村里许多家庭都富裕起来了。	3.57	71.4	3.06	50.0	4.00	85.7	3.62	71.7
E2: 大部分收益流向了地方精英、外来开发商、政府机构。	3.71	71.4	4.33	83.3	2.89	35.7	3.49	56.6
E3: 居民的贫富差距加大。	3.86	85.7	3.83	77.8	3.54	67.9	3.68	73.6
E4: 就业机会增加了，外出的青壮年人口回到村里就业。	3.29	57.1	3.06	50.0	3.36	57.1	3.25	54.7
$\bar{E}$ (F=7.228; Sig.=0.002)	2.82	28.6	2.49	16.7	3.23	57.1	2.92	39.6
标准差	0.61		0.82		0.54		0.73	
C1: 独特文化价值得到外部肯定，村民自豪感增强。	3.57	57.1	3.89	72.2	3.79	71.4	3.79	69.8
C2: 许多村民吸纳了外来价值观念，失去了对传统文化的尊重。	3.14	42.9	2.83	33.3	3.25	50	3.09	43.4
C3: 旅游发展破坏了当地传统的民族文化。	3.00	42.9	2.17	22.2	2.89	46.4	2.66	35.8
C4: 游客歧视影响自尊心。	2.71	42.9	3.22	44.4	3.46	64.3	3.28	54.7
$\bar{C}$ (F=1.746; Sig.=0.185)	3.18	57.1	3.42	61.1	3.04	39.3	3.19	49.1
标准差	0.70		0.66		0.65		0.67	
S1: 村民之间为经济利益相互竞争，导致人际关系变得淡薄。	3.43	71.4	3.56	61.1	3.68	67.9	3.60	66.0
S2: 就业和挣钱机会增加，妇女和年轻人的社会地位提高。	3.14	71.4	3.61	72.2	3.43	57.1	3.45	62.3
S3: 村里基础设施得到改善，如修建学校或改进道路交通。	3.71	71.4	4.06	77.8	3.96	82.1	3.96	79.2
S4: 本地打架、吸毒、赌博等社会问题增加。	2.29	28.6	1.61	5.6	2.82	39.3	2.34	26.4
$\bar{S}$ (F=2.265; Sig.=0.114)	3.29	57.1	3.63	66.7	3.22	46.4	3.37	54.7
标准差	0.53		0.66		0.64		0.65	

注：E2、E3、C2、C3、C4、S1、S4 为需要校正的反向观测变量。

经济方面,居民普遍认可“发展旅游使村里许多家庭都富裕起来了”、村民“就业机会增加了”。如果说旅游扶贫的根本目的是居民收入增加,该目标已基本实现。但遗憾的是,更强的负向感知最终冲消了正面影响。引发负向感知的主要因素来源于“大部分收益流向了地方精英、外来开发商、政府机构”和“居民的贫富差距加大”两方面。村内除当地人开展的家庭接待外,还有几家外来开发商经营的餐馆、饭店,他们凭借雄厚的资金实力和人脉关系,往往拥有更大的经营规模和更广的市场营销渠道,如笔者在额尔古纳住宿时,在饭店前台就发现了其中一家的广告页。对于这一点,从事家庭游接待的第1组、2组受挤压的感觉更突出,特别是还在起步阶段的第2组,同意率达到83.3%。从原来的普遍贫困到现在的贫富差距扩大是引发居民负向感知的另一主因。受调查家庭年收入超过8万元的4户全部在第1组,最高的家庭2007年达到38万左右,是当地普遍的家庭年收入(1~3万)的10~20倍。贫富悬殊的背景,让多数人都感到自己相对贫困,自己是穷人,自己的利益受到“剥夺”<sup>[27]</sup>。从第3组到第1组,组内贫富差距逐渐拉大,居民对该问题的感知也更趋强烈,第1组对此问题同意率高达85.7%。值得注意的是第2组,从事家庭游的前期投入较高,高投入必然引发对高收益的期待,而作为后来者在诸多方面的限制,使他们又很难在短时间内达到期望目标,结果正向感知弱,负面体验却最强。与此相反,第3组对家庭游所带来的经济收益持更加乐观的态度,这也促使他们开始考虑是否在一两年内加入其中。

民众心理失衡将直接威胁到人际关系和谐,甚至引发冲突。因此在对旅游的社会影响充分肯定的同时,66.0%的居民认同“村民之间为经济利益相互竞争,导致人际关系变得淡薄”。访谈中发现,村民间矛盾呈现多角度、广泛性特点。既表现为俄罗斯家庭对其他民族从事家庭游的质疑,也表现为俄罗斯家庭内部因利益和争夺客源而引发的矛盾;既表现为第一批接待家庭与后进入者之间的矛盾,也表现为同一组别内部不同家庭间的纷争。但截止到调查时,村民间依旧保持着相对纯朴的民风,打架、吸毒、赌博等社会问题几乎没有,这也是维持当地社会秩序和谐,吸引游客到访的重要因素之一。此外,居民对政府在社会环境改善方面所做的努力,如基础设施建设、妇女和年轻人社会地位提高等多予以了充分肯定。

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精神支柱和自豪感的源泉,也是一个旅游目的地的魅力所在。但访谈中注意到,绝大多数接待家庭对游客持完全接纳的态度,仅有1户反映,当地生活用水匮乏与大城市游客每日洗浴的习惯有冲突。调查发现,与社会影响相似,第1组、2组都表现出对文化影响的正向感知,而第3组则呈现明显的负向感知。第3组在当地旅游业发展中分享到的利益最少,因此虽与游客接触不多,却有最高比例的家庭(64.3%)认为“游客歧视影响自尊心”,50%的人认为“许多村民吸纳了外来价值观念,失去了对传统文化的尊重”。而作为从事旅游业的第1组、2组而言,正如Doxey<sup>[14]</sup>的模型所呈现的,多处于“陶醉”期,对游客更友好,正向感知更强烈。

许多事实也证明,经济上落后的地区,当地居民往往会低估旅游发展的成本代价而高估旅游带来的收益<sup>[28]</sup>。Milinan等<sup>[29]</sup>、Liu等<sup>[30]</sup>研究也发现依赖于旅游就业的居民对旅游及旅游者的态度比较积极、友善,更可能倾向于支持旅游发展。正向的社会文化影响感知源于居民对经济利益的追求,被弱化的负面感知往往会在经济发展后凸显。同时,社区中未从旅游业中获利的居民即使在旅游发展初期,负面感知也较强烈。因此,即使是以扶贫为目标发展旅游业的地方政府,也必须在一开始就意识到该规律,并在政策等相关方面

做出调整。

#### 4.3 强旅游支持与弱幸福感

表 4 可见，室韦村居民大多支持旅游发展，70%左右的家庭认为“发展旅游业的土地利用方式比其他土地利用方式更好”、“发展旅游的正面影响大于负面影响”。对于这个地处偏远，自然条件又不占优势的小村而言，旅游业为其经济发展带来了契机，因而也获得了居民的认可。

表 4 居民的旅游支持度和幸福感

Tab. 4 Resident attitude to tourism development and resident happiness

问题	第 1 组		第 2 组		第 3 组		总体	
	均值	同意(%)	均值	同意(%)	均值	同意(%)	均值	同意(%)
发展旅游业的土地利用方式比其他土地利用方式更好。	3.71	57.1	3.89	72.2	3.71	67.9	3.77	67.9
发展旅游的正面影响大于负面影响。	3.71	71.4	3.94	72.2	3.71	71.4	3.79	71.7
幸福的感觉增加了。	3.43	42.9	3.17	44.4	2.89	42.9	3.06	43.4

在强旅游支持和收入提高的现实背后，居民在经济、社会和文化影响感知上面临的诸多问题，则制约了居民幸福感的提高。统计显示 60%左右的家庭否定“幸福的感觉增加了。”家庭年收入和居民幸福感之间的相关系数仅为 0.02。特别是第 1 组，幸福感和收入之间甚者呈中等程度的负相关（相关系数为 -0.42）。具体分析，收入仍然处于 3 万元以下的第一组家庭 2 户，平均幸福感得分为 3.5；收入为 3~5 万的家庭 1 户，幸福感得分最高，为 5 分；收入超过 8 万元的 4 户，平均幸福感得分却只有 3 分。从基本的微观经济学可知，收入增加会扩张生产可能性和预算线的边界，使消费者到达更高的效用无差异曲线，从而获得更高的满足程度<sup>[31]</sup>。因此，主流经济学中收入和幸福的关系被“设定”为正向相关。而基于心理学以及其他社会科学的实证研究对传统的结论提出了质疑。这类结论如，“人均收入的增加和平均幸福水平几乎不相关或即使相关也很小。……即使是在幸福水平较低、较穷的国家，也不存在平均收入水平和平均幸福水平的明显相关性，这表明有许多其他因素在起作用，其中包括文化特征”<sup>[32]</sup>。2005~2009 年间，一项涉及 132 个国家 136000 人参加的盖洛普民意测验（Gallup poll）的结果也表明，幸福更多的来自于被尊重、对生活有控制感、有一份令人愉快的工作等<sup>[33]</sup>。

以收入作为控制变量，剔除掉其可能对幸福感造成的影响，使用偏相关分析初步探讨影响不同组别居民幸福感的因子，选择  $R > 0.4$ （中等程度相关以上）且  $\text{Sig. (2-tailed)} < 0.10$ （超过 90%的置信水平）的因素（表 5）。第 1 组中虽未发现对幸福感造成明显影响的因子，但特别是最富裕的 4 户家庭，除了在“独特文化价值得到外部肯定，村民自豪感增强”、“就业和挣钱机会增加，妇女和年轻人的社会地位提高”等正向性问题上感知明显高于平均水平外，在几乎所有负向性问题上感知都更强烈。访谈中也观察到，他们目前与其他家庭人际关系疏远，甚至敌对，客源的压力使其对生活的控制感降低，工作中碰到许多新问题等待解决，这些负面感知远远超过了收入提高所带来的满足感。第 2 组居民更在意未来能否在就业和挣钱方面有更多机会，希望避免打架、吸毒等直接威胁到地区旅游业发展的恶性社会问题的发生。综合看，第 2 组的幸福感与对今后生活能否有更强的控制感息息相关。第 3 组则更关注旅游发展是否破坏了当地传统的民族文化，以及村民之间能

否保持良好的人际关系。文化是一个地方的灵魂,对生活于其中的个体而言,是一种生活方式。独特的文化背景下长久形成的人与人之间相对稳定的社会关系、交往模式、价值认同是维系大多数居民内心幸福感的源泉。旅游发展给第3组带来的利益的满足更少,他们保持原有生活方式的愿望则更强烈。

表 5 旅游影响感知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

Tab. 5 Impact of resident tourism perceptions on resident happiness

组别	影响因素	R	Sig. (2-tailed)
第 2 组	S2: 就业和挣钱机会增加, 妇女和年轻人的社会地位提高。	0.428	0.087
	S4: 本地打架、吸毒、赌博等社会问题增加。	-0.477	0.053
第 3 组	C1: 旅游发展破坏了当地传统的民族文化。	-0.482**	0.011
	S1: 村民之间为经济利益相互竞争, 导致人际关系变得淡薄。	-0.428*	0.026

注: 概率  $P < 0.05$  的系数值旁标记了一个星号,  $P < 0.01$  的则标记两个星号。

#### 4.4 高参与意愿与低政策评价

在室韦旅游扶贫中, 额尔古纳各级政府做了很多工作。从最初争取到 20 万扶贫基金作为启动资金, 到 2005 年的成功营销使室韦乡入选“全国十佳魅力名镇”; 从让村庄焕然一新各项基础设施建设, 到正在启动的室韦村旅游发展规划; 从组织村民赴俄罗斯考察、请老师来村中讲解如何做好家庭游, 到筹措资金使 60% 家庭安装电脑并进行网上宣传。甚至, 额尔古纳旅游局已开始敦促室韦村建立村民自治的家庭游协会。但无论是访谈中反馈的信息, 还是问卷调查结果都未给政府打出太高的分数。对于“政府政策能适应旅游发展需求”的问题, 只有 9.4% 的居民持认可的态度, 即使在旅游业发展中受益最多的第 1 组, 也只有 14.3% 的人同意。

表 6 居民的参与意愿和政策评价

Tab. 6 Desire for participation and resident evaluation of policies

问题	第 1 组		第 2 组		第 3 组		总体	
	均值	同意 (%)	均值	同意 (%)	均值	同意 (%)	均值	同意 (%)
P1: 有一与政府对等、由村民参与的组织机构共同管理旅游业。	3.29	42.9	3.67	61.1	3.82	60.7	3.70	58.5
P2: 村民 (包括妇女和年轻人) 都有机会和权力发表关于是否发展旅游或应该怎样发展旅游的看法。	3.57	57.1	3.39	55.6	3.50	71.4	3.47	64.2
P3: 旅游发展主要依靠政府的规划和管理。	3.00	28.6	3.67	66.7	3.64	67.9	3.57	62.3
P4: 有适当途径可及时获得当地旅游业发展动态的信息。	3.00	42.9	3.39	61.1	3.32	53.6	3.30	54.7
P5: 愿意接受更多教育和培训。	3.86	71.4	4.28	88.9	3.86	75.0	4.00	79.2
P6: 参与和当地发展旅游有关的决策的制定。	3.86	71.4	3.83	83.3	3.32	53.6	3.57	66.0
$\bar{P}$ ( $F=0.228$ ; $Sig.=0.797$ )	3.43	85.7	3.48	66.7	3.36	75.0	3.41	73.6
标准差	0.48		0.60		0.60		0.58	
政府政策能适应旅游发展需求。	2.57	14.3	2.22	11.1	2.04	7.1	2.17	9.4

注: P3 为需校正的反向观测变量。P 代表平均的参与热情, 为对反向观测变量校正后取均值获得。

低政策评价源于政策多是政府的一厢情愿，缺乏对居民感知，特别是居民感知的差异性和动态性的深刻了解，重视了经济发展，却忽视了可能的社会文化问题。加之对居民参与旅游发展的能力培养，参与意愿把握和引导不够，结果是社区居民参与热情高，却无技、无处施展，政府“呕心沥血”，却未换得与付出对等的评价。

表6可见，居民总的参与热情较高，尤其是第1组， $\bar{P}$ 大于3，85.7%的居民态度积极。但不同组别的家庭参与意愿也有差异。第1组对政府的依赖度低，对建立家庭游协会缺少热情，对旅游信息也不太关注，但渴望接受更多的教育和培训，希望有更多机会表达如何发展旅游的看法，甚至参与当地相关决策的制定。第2组除对教育和培训、决策制定有很大热情外，对政府依赖度也较高，信息获取、协会建立的愿望较为强烈。第3组因大多尚未从事旅游相关工作，参与决策制定和了解旅游信息的愿望不强，但希望有机会和权力发表关于是否发展旅游或应该怎样发展旅游的看法，与第2组一样，他们对政府的依赖度较高，参与相关协会的热情也较高。

## 5 结论与讨论

旅游资源优势与贫困叠加的现实，使旅游业成为许多乡村的支柱产业。相比于一般区域，贫困地区旅游开发将面对更加薄弱的物质基础以及更为复杂的居民心理变化历程，这都加剧了其发展难度。马勇等<sup>[34]</sup>在西部地区也发现，虽有个别地方“一夜成名”，但经常亦是“昙花一现”。凭借特色旅游资源出名之后，快速发展引发的错综的矛盾常令很多乡村进入发展瓶颈期。本文针对此问题，以内蒙古中俄边境村落室韦俄罗斯民族村为例，以居民介入当地“家庭游”的时间不同分组，通过深度访谈和问卷调查，从居民的旅游感知、幸福感来源、旅游参与意愿等方面深入剖析了困扰村落未来发展的主要矛盾。症结的发现有利于矛盾的疏解，政策上的有效纠偏可使这些地区逾越瓶颈，进一步获得持续稳定的发展。此外，本研究也印证了国外学者两大发现，其一，即使是在幸福水平较低、较穷的国家，也不存在平均收入水平和平均幸福水平的明显相关性<sup>[32]</sup>；其二，只有少数居民的乡村地区，居民在认知上也会呈现多样化反映<sup>[22]</sup>。对上述问题的澄清有利于更好地制订相关政策。

政策调整的方向之一是旅游扶贫目标不应该经济独大，而应是多元的。正如PPT项目中经常提及的，在旅游发展和减贫战略的关系中，学术和发展部门都越发关注到将公平和居民福祉作为旅游发展的目标<sup>[35]</sup>。亚洲开发银行的减贫战略中也提到<sup>[36]</sup>，有利于贫困人口的增长应该能够吸纳劳动力、有相应的减少不公平的政策和计划以及可改善穷人的收入和就业。从国际扶贫经验以及室韦村所呈现的主要矛盾看，多元目标涉及三方面的核心支撑，即收入提高、分配公平和文化保护。收入的提高是个人和地区财富不断累积的根本；分配公平是保障社会和谐、个体心理平衡的关键；独特的文化是地区魅力所在，既有凝聚人心之力，又是居民自豪感的源泉。目前我国很多贫困地区的扶贫政策大多围绕经济展开，另外两个支点的短缺，有碍居民幸福感提升，也难使政府政策获得高分。如同专业技能的培养一样，居民社区参与能力也需要同步提高，家庭游协会的建立是一个很好的尝试，但要通过能力建设真正实现村民自治。心理增权方面应挖掘当地文化的独特价值所在，培养居民自信心。并以文化为媒介，如通过俄罗斯民族节庆活动、传统技能传习等，聚敛民心，构建和谐的人际关系。注重居民间沟通，使后来者（第2组、3组）理解开拓者（第1组）所承担的风险，加强其相关经验的学习；同时也要发挥走向富裕的经营者在

参与决策方面的热情,引导他们承担起更多的社区责任。目前,室韦也在鼓励富裕户带动贫困户,但这还只是个人的、自发的、道德层面的。政府还应从政策的层面均衡利益的分配,如根据床位数目收取税收,募集社区发展基金;限制富裕户不断扩大规模,避免恶性竞争;规定规模较大的接待户和外来开发商解决一定比例的当地人就业等。

政策调整的另一方向是差异化和动态性,尊重社区居民的非同质化特征,适应快速发展的需求。初期,政府主要担当开拓者和推动者的角色。在此阶段,室韦乡政府的工作是出色的,短时间内带领偏远乡村摆脱了困局,开拓了局面。局面打开之后,政府的工作也应相应调整。快速发展阶段,各种矛盾开始显现,政府在部分保持开拓者的角色同时,还应针对变化的社区环境,担当起规范者和协调者的角色。此时,社区居民已呈现出明显的差异化特征,优惠与扶贫政策要转向相对更加贫困的人群。第1组居民,特别是其中高收入者,客源较稳定,资金较充裕,扩大规模的愿望强烈。政府应及时行使规范的职能,使他们提高服务质量、保护环境,将规模控制在适度的范围内,并给他们创造机会,鼓励他们更好地回馈社会,与其他家庭构建起新型的和谐关系,进而也增加其自身的幸福感。第2组作为新进入者,在技能和市场方面处于明显的劣势。政府要协助他们开拓市场,为他们提供更多的教育和培训机会。国外经验表明,建立在线预订企业不仅可以拓展市场,还可以缩短旅游产品供应链,为贫困人口拓展获利空间<sup>[15]</sup>,从扶贫方式上要优于简单的将计算机派发给居民。第3组是暂时的旁观者,他们对家庭游的经济收益非常乐观,随时准备进入。政府要调整他们的期待,并积极拓展新市场解决就业。更多家庭游的进入者无疑会加剧恶性竞争,而开拓更多元化的产品将有利于本地区的平衡发展。2007年开始的骑马游是一个新的尝试,此外,手工艺品的制作和销售、特色食品的生产、音乐和歌舞表演,利用当地丰富的鸟类、植物资源开展的解说服务等,都可考虑。

伴随旅游业的发展,社区居民能力的提高,政府的角色将由“管理者”彻底转变为“服务者”,建立起以居民为基础,非政府组织、企业等多方参与的发展框架,才能确保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总之,让更多的人分享到旅游发展的益处,使各类居民各得其所,以多元化的发展持续提升居民幸福感,是旅游扶贫的最终目标。

#### 参考文献:

- [1] 世界银行东亚及太平洋地区扶贫与经济管理局. 从贫困地区到贫困人群:中国扶贫议程的演进. 世界银行网站, 2009. V. [http://www.ctc-health.org.cn/file/China\\_PA\\_Report\\_March\\_2009\\_chn.pdf](http://www.ctc-health.org.cn/file/China_PA_Report_March_2009_chn.pdf). 2011-10-26.
- [2] 李佳,钟林生,成升魁. 中国旅游扶贫研究进展.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09,19(3):156~162.
- [3] 丁焕峰. 国内旅游扶贫研究述评. 旅游学刊,2004,19(3):32~36.
- [4] 曾本祥. 中国旅游扶贫研究综述. 旅游学刊,2006,21(2):89~94.
- [5] 王莉,陆林. 国外旅游地居民对旅游影响的感知与态度研究综述及启示. 旅游学刊,2005,20(3):87~93.
- [6] Andereck K L, Vogt C A.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residents' attitudes toward tourism and tourism development options. *Journal of Travel Research*, 2000, 39 (1): 27~36.
- [7] Ko D W, Stewart W P. A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 of residents' attitudes for tourism development. *Tourism Management*, 2002, 23 (5): 521~530.
- [8] Davis J S, Morais D B. Factions and enclaves: Small towns and socially unsustainable tourism development. *Journal of Travel Research*, 2004, 43 (1): 3~10.
- [9] 黄震方,顾秋实,袁林旺. 旅游目的地居民感知及态度研究进展. 南京师大学报(自然科学版), 2008, 31(2): 111~118.
- [10] 许振晓,张捷,Geoffrey Wall,等. 居民地方感对区域旅游发展支持度影响——以九寨沟旅游核心社区为例. 地

- 理学报,2009,64(6):736~744.
- [11] 李东和,张捷,章尚正,等. 居民旅游影响感知和态度的空间分异——以黄山风景区为例. 地理研究,2008,27(4):963~972.
- [12] 卢松,张捷,苏勤. 旅游地居民对旅游影响感知与态度的历时性分析——以世界文化遗产西递景区为例. 地理研究,2009,28(2):536~548.
- [13] 黄玉理,龙良富,王玉琼. 我国世界遗产地居民对旅游影响感知与态度的比较研究——以平遥、丽江古城为例. 人文地理,2008,23(2):91~94.
- [14] Doxey G V. A causation theory of visitor-resident irritants: Methodology and research inferences. In: Travel and Tourism Research Associations Sixth Annual Conference Proceedings. San Diego,1975. 195~198.
- [15] 雷慧平. 贫困人口在旅游开发中的收益研究. 西安:西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8. 7.
- [16] 张伟,张建春,魏鸿雁. 基于贫困人口发展的旅游扶贫效应评估——以安徽省铜锣寨风景区为例. 旅游学刊,2005,20(5):43~49.
- [17] 祁惠君. 中国俄罗斯族民俗游初探——以中俄边境小镇室韦为例. 黑龙江民族丛刊,2009,109(2):69~73.
- [18] 额尔古纳市政协调研组. 室韦俄罗斯族乡家庭旅游情况调查报告. 内蒙古:中共额尔古纳市委办公室,2008. 2.
- [19]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经济发展司. 额尔古纳市室韦俄罗斯族乡:民俗家庭游拓新路. <http://www.seac.gov.cn/gjmw/zt/2009-07-5/1247626993940403.htm>, 2009-07-15.
- [20] 牛美丽. 公共行政学观照下的定性研究方法. 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46(3):76~79.
- [21] 林淑芬. 奋起湖地区居民对观光发展态度之研究——社会交换理论之应用. 台湾:国立中兴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3. 12.
- [22] Lankford S V,Howard D R. Developing a tourism impact attitude scale. *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1994,21(1):121~139.
- [23] Gay L R. *Educational Research Competencies for Analysis and Application*. New York: Macmillan,1992.
- [24] 张莉汶. 社区居民对社区观光发展态度之研究——以马太鞍湿地为例. 台湾:静宜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8. 29.
- [25] 陈正丰. 原住民部落文化观光发展之再现与冲突——以雾台部落为例. 台湾:国立东华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6.
- [26] 奚恺元,王佳艺,陈景秋. 撬动幸福:一本系统介绍幸福学的书. 北京:中信出版社,2008. 19.
- [27] 张巍. 社会心理学视野下的和谐社会与贫富差距. *经济与社会发展*,2008,6(12):17~19.
- [28] 向明. 基于社区居民感知与态度的民族村寨旅游发展研究——以德夯苗寨为例. 西安:陕西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8. 13.
- [29] Milman A ,Pizam A . Social impacts of tourism on central Florida. *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1988, 15(2): 191~204.
- [30] Liu J C,Var T. Resident attitudes toward tourism impacts in Hawaii. *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1986,13(2) : 193~214.
- [31] 赵奉军. 收入与幸福关系的经济学考察. *财经研究*,2004,30(5):75~84.
- [32] Graham C. The economics of happiness. In: Durlauf S N,Blume L E. *The New Palgrave Dictionary of Economics*. Cheltenham: Macmillan Publishing Ltd. ,2nd edition,2005. 1~19.
- [33] Diener E, Ng W, Harter J, et al. Wealth and happiness across the world: Material prosperity predicts life evaluation, whereas psychosocial prosperity predicts positive feeling.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2010, 99 (1): 52~61.
- [34] 马勇,夏沫. 我国西部旅游的深度开发与创新思考. *桂林旅游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3,14 (4):5~8, 17.
- [35] Hall C M. Pro-poor tourism: who benefits? Perspectives on tourism and poverty reduction. Clevedon: Channel View Publications,2007. 2.
- [36] Laws E. ProPoor tourism-who benefits? Perspectives on tourism and poverty reduction(book reviews) . *Tourism Management*,2009,30 :143~145.

## Differentiation and principal contradictions of residents' attitudes during Pro-Poor Tourism development in poor rural communities: The case of Shiwei village on the Sino-Russian border

LI Yan-qin

(The School of Management, Central University for Nationalities, Beijing 100081, China)

**Abstract:** Due to the presence of beautiful scenery or unique customs amid economic difficulties, many poor rural communities in China use tourism development as a strategy to alleviate poverty. However, after successful marketing campaigns make them famous, increased numbers of tourists in these locations with more money often cause more conflicts between residents, which could prevent these villages from developing. This study takes the Russian minority village of Shiwei on the Chinese side of the Sino-Russian border as an example. For a deep understanding of the kinds of development dilemmas residents face and how residents' perception and attitudes are formed, qualitative and quantitative methods were applied in this study.

The results of this study suggest three contradictions in residents' attitudes to tourism in Shiwei. First of all, tourism development has brought positive social and cultural benefits to Shiwei, but most residents have a negative perception of economic benefits mostly due to a rich-poor gap. Secondly, surprisingly, it appears that residents strongly support the development of tourism, but more wealth does not bring more happiness to them. In contrast, feelings of happiness are most associated with a sense of being in control of one's life, and preserving local culture and existing harmonious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s. This finding confirms results from previous studies. Thirdly, most residents have a high dependence on the government and a strong willingness to participate in the development of local tourism, despite their very low opinion of government policy. The findings also demonstrate that the three groups have different characteristics. According to the results of this study, China's Pro-Poor tourism policy should make adjustments in order to ensur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Firstly, the goal of the Pro-Poor tourism policy is not only about the economy and a higher income, but also about the fair distribution of wealth and protection of the indigenous culture, both of which should be at their core support of poverty alleviation for residents' happiness. Secondly, the policy should respect the different characters of community residents and should be dynamic so as to continuously give more opportunities to more poor people.

**Key words:** PPT (Pro-Poor Tourism); contradictions; community residents; differentiation of the attitude; Shiwei village